

师之大者

□ 王兆贵

在我国明清两代，有这样一类人，他们入世但不入仕，靠为地方官出谋划策立身，民间管他们叫师爷。由此还催生了一个地域性的特殊群体：绍兴师爷。师爷尽管也被尊称为西席、西宾，但并非传道授业者，而是地方官署的顾问和佐助。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不在编，无官禄，薪酬须由雇主按协议循例给付。

与乡间塾师比，师爷算得上师之大者了，但还有比师爷层次更高的职业，他们的雇主在庙堂，是皇室聘请的老师。这类人中，教导出来的皇子皇孙将来若能继承大统，通常被尊为帝师。能为储君做老师的人，必须资质可靠、端端正派，同时兼具学识渊博、学养丰厚、眼界高远、教谕有方等特质，方可胜任。

按理说，为师本无大小之分。“师之大者”亦非“大师”，而是特指帝师这一为数不多的特殊人群。其实，儿皇帝的老师何尝不是“幼师”呢？与师爷不同的是，帝师通常是有正式名分的人，太子登基后由幕后走上前台，辅助皇帝临朝理政。

历史上被称为帝师的人，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专职或兼职教太子读书的老师，专职帝师的会在完成侍读后隐退；一类是教辅太子登基后继续在朝为官，卓有建树、德高望重者有可能成为皇帝的股肱、朝廷的重臣；还有一类帝师，并没有进官做过侍读，而是被皇帝相中后，直接聘为辅政大臣，运筹帷幄、出谋划策。司马迁在《留侯世家》中写道：“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於良足矣。”这番感慨中提到的“帝者师”，包括此前被秦国国君拜为客卿者，都属于这一类人。此外，还有一种情形，即所谓“经筵帝者师”。我国自汉唐以来，始设御前讲席，并逐渐形成规制，宋代

称为“经筵”，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地开设讲席，旨在帮助执政者继续学习，不断提高治理天下的能力。能在御前为帝王讲述经史的人，尽管是翰林、学士中的佼佼者，但在广义上亦可视为帝师。

帝师并非官职，而是名分。他们的职称，因朝代不同、资历不同而有所不同。始于商周的太师、太傅、太保，即位列三公者，均可视为帝师。尽管是加封的荣誉衔，但在朝廷中却最为尊贵，只有元老级大臣才能获此殊荣。即便是万人之上的帝王，对他们也是信赖有加，毕恭毕敬。史上比较有名的帝师，如张良之前的善卷、伊尹、姜尚、姬旦、鲍叔牙、管仲、商鞅等，张良之后的诸葛亮、房玄龄、刘基、张居正、方孝孺、姚广孝、陈廷敬等，都是著名的教育家和谋略家，他们的作为或多或少地左右着朝政大局，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历史发展的走向。

有人说，帝师是个“高风险职业”，这样的说法也未必准确。如果说有风险，他们所面临的风险同朝廷其他重臣也是等同的。位高权重，荣宠过盛，容易遭嫉；新帝清算前朝旧账时，有时也会波及到帝师。这两条对其他朝臣来说，何尝不是如此呢？相反，由于近距离接触久矣，帝师对皇家父子的脾气摸得很透，且建立起一定的感情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招致杀身之祸的风险相对低些。他们在皇上面前，往往可以直陈胸臆，不必像其他大臣那样战战兢兢、诚惶诚恐。

乾隆皇帝为了加强对上书房的管理，曾于授读师傅之上增设督课总师傅，例由德高望重的一品大员兼任。一次，乾隆巡查上书房，见担任督课总师傅的王杰正在罚太子下跪，就让太子站起来，不无生气地质问说：教者天子，不教者亦天子，君君臣臣

乎？——你教不教我们，我们都是皇子龙脉。你这样罚我们，是臣对君应该有的态度吗？王杰不卑不亢地应道：教者尧舜，不教者桀纣，为师之道耳！——虚心受教的将来能成为尧舜那样的明君，不受教就会成为桀纣那样的昏君，师道不就正该如此吗？王杰的应答，有理、有力、有节，对于乾隆来说，不啻于当头棒喝，幡然醒悟，遂令太子接着罚跪。王杰在朝四十余年，忠直端谨，不偏不党，高寿而歿，被迫赠为太子太师，谥号文端。真正做到了为人师表、善始善终。

欧阳修在《答祖择之书》中提出：“古之学者必严其师，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笃敬，笃敬然后能自守，能自守然后果于用，果于用然后不畏而不迁。”大意是说，古代学者必先敬重老师，老师受到敬重，他传授的学问和道理才会受到尊崇；学问和道理受到尊崇，学者才会深怀敬意；深怀敬意，才会坚信不疑；坚信不疑，才能敢于施行；敢于施行，才能无所畏惧而不改变操守。尊师重教是我国延续千年的优良传统，为人师表则是授业者的基本素养。授业者要得到学生乃至全社会的尊重，其德其能须率先垂范。能为帝师的那些古代先贤们，就是如此。他们所面对的学生尽管并非等闲之辈，但却仍能坚持从严执教，不违本心，为能培养出一代英明有为、造福国民的君主而鞠躬尽瘁。



名画里的时苗留犊

□ 陈亮

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着宋末元初著名画家钱选的一幅传世之作《时苗留犊图》。虽历经千年，但画面里刻画的人物今天看来依然栩栩如生，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是中国古代文人画中的巅峰之作。画面中的诸多人物神情自若，画面中央，东汉名臣时苗面对一群乡亲，双手作揖，神色宁静，谦让劝止。他身后，一个少年右手执枝，左手按在牛犊的背上。少年背后的牛车

简陋寒酸，一名驭手牵车代发，两名百姓一人挡在车头，另一人试图阻止车轮前行。画面左侧的一群人，有古稀老人，也有黄口小儿、老嫗少妇，亦有方袍之僧、黄冠之徒。众人举止各异，神态自然。

钱选所绘的这幅名画讲述了一个温暖的故事。东汉末年，朝政昏暗，军阀割据，社会动荡。河北巨鹿人时苗出任寿春令，去时，乘坐一辆牛车上任。一年过后，这母子牛生一小犊。时苗离任时，只将母牛带走，不顾众人劝说，坚持将小牛留在寿春。从此后，“留犊”就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为官清廉的代名词而为历代人们所推崇。

魏郎中鱼豢所撰《魏略》将其列入《清介传》，“清介”即“清正耿直”。到了宋代，史学家裴松之为《三国志·魏志二十三》作注时，生动记载了这一事件：“出为寿春令，令行风靡……始之官，乘薄伞车，黄犊牛，布被囊。居官岁餘，牛生一犊。及其去，留其犊，谓主簿曰：‘令来时本无此犊，犊是淮南所生也。’”群吏曰：“六畜不识父，自当随母。”苗不听，时人皆以为激，然由此名闻天下。”

而时苗为官的安徽寿春（今淮南市寿县）的地方志《寿县志》则将时苗在寿春为官的操守记载得更为清楚：“教民有法，平昔以廉守自微，在官之日，不外观，惟一牝牛，驾轻车而已，踰年，牝牛生小犊……吾不敢携归乡间。民感其意，相送于道。”

当时的百姓深感时苗的品德，竭力要求时苗将小牛犊带走。甚至不惜“攀辕卧辙”，爬上车辕，躺在道前，阻止时苗离开脚步。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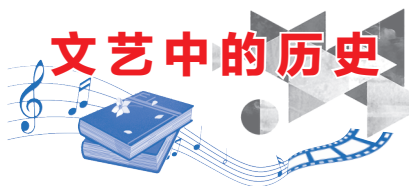
是“六畜不识父，自当随母”。其实时苗带走牛犊也无可厚非。但时苗却以这头牛吃的是淮南草，饮的是寿春水，小牛犊也是在寿春的土地上所生，理应归寿春为由而坚拒。

当时就有人认为时苗行为偏激，有沽名钓誉之嫌。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然，纵观时苗一生，他清白、廉洁、刚正、耿直，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后不满曹操专权朝政而辞官。这正是一个为官者的基本准则和操守。尤其在东汉末年战乱连连、社会动荡、人心不古的时代背景下，时苗凭的是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品德修养和人生底气。

清朝寿州主事董豫曾写下一首诗：“去任无惭到任时，独留一犊饮斯池。廉名不特当时重，遗爱能令去后思。千载清名垂古史，半池明月映荒祠。停驂几度池边立，漫剔苍苔诵勒诗。”

“廉名不特当时重，遗爱能令去后思”这两句诗很好地诠释了时苗留犊的价值所在和精神归宿。时苗留下的不仅仅是一只小牛犊，而是遗留下中华民族无私奉公的高风亮节和做官做人的价值准则。

而后世，时苗也作为古代清官的典范受到各个时代官员、百姓的一致推崇。《蒙求》《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启蒙读物都将时苗留犊的事迹收录其中，为的是给孩子正确地系上人生第一粒扣子。



有朋友问我，历史上系统评价司马迁的人是谁，我肯定地回答，是汉代的班固，因为班固所著《汉书》中有专门为司马迁作的传记，说司马迁“不虛美、不隱惡”，这也成了后世对司马迁评价的共识。最近读《后汉书·班彪列传》，发现早在班固之前，班彪对司马迁就有较为全面的评价，班固后来的评价应该是受了班彪的影响，因为班彪是班固的父亲。

班彪首先肯定了司马迁的贡献，认为司马迁采集《左氏》《国语》，删削《世本》《战国策》，根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起，下至汉武帝为止，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共一百三十篇。司马迁的《史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充分肯定了司马迁对中国 3000 多年历史的记录，《史记》是黄帝以来众多历史典籍的集大成者，司马迁的功劳是巨大的，对社会的贡献是巨大的。

班彪对司马迁的文采给予了很高的赞誉。认为司马迁：“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司马迁善于叙述事理，文笔畅达而不华丽，质朴而不粗野，文饰润色恰到好处，这就是好的史学家。确实，在历代史学家中，还没有哪一位的文笔能超越司马迁，《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通过对一个个历史人物的生动刻画，写出了中国历史的“行”和“势”，写出了仁人先贤的“魂”和“魄”。可以说，司马迁将中国历史拟人化、生命化了，这是其他史学家无法比拟的。尤其可贵的是，司马迁时期，汉赋是文学的主流，司马迁能够逆流而动，不用整齐的形容、排比、对仗，不用华丽辞藻的铺陈、堆砌，而用从容朴素、简洁明了的自然文句，就为我们铺展了一幅幅波澜壮阔、动人心弦的历史画卷，这些实在令人敬佩，班彪评价司马迁为“良史之才”当之无愧。

班彪对司马迁也给予了批评。认为他有些离经判道，“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

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蔽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就是说司马迁学术上推崇黄老之道，轻视儒家《五经》，这是没有走“正道”；写货殖传，轻仁义而以贫穷为耻，看不起穷人；写游侠之士，轻视那些节烈的人，推崇世俗建功之士。指出这是司马迁的大毛病，有伤儒家正道，所以才导致腐刑。班彪的这个评价有失偏颇，因为司马迁所处的时代，黄老学说和儒家思想并存共生，都有一定的市场，而司马迁偏重于黄帝之学和老子之学，崇尚修身养性、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等。班彪、班固所处的东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班彪、班固都是儒家的忠实信徒，这样就与司马迁的思想体系有了冲突，评价自然也就不客观了。难怪班彪评价说：“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如果让司马迁遵照《五经》的礼法之言，符合圣人的是非标准，那就差不多了。当然，这只能是班彪的一家之言，司马迁是不会认同的。

班彪对司马迁《史记》体例和写法也提出了质疑。认为司马迁替帝王作传称为本纪，写公侯传国称为世家，写卿士特起称为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但他把项羽、陈涉列入本纪和世家，而淮南王、衡山王降为列传，造成体例混乱。指出司马迁的收删删繁也有瑕疵，不够整齐划一。例如写司马相如，写了出生的郡县，写了他的表字，至于写到萧何、曹参、陈平等，以及董仲舒同时期的人，就不记载他们的表字，有些只写了县而不写郡。都是疏忽的地方，也是一个毛病。班彪由此进一步说：“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今后写历史，必须严格核对事实，修饰文字，统一体例，写世家，只要纪、传就够了。所以班固的《汉书》就取消了“世家”，将其并入列传。

纵观班彪对司马迁的评价，有

班彪对司马迁的辩证评价

□ 吉炳伟

肯定和赞誉，也有批评和质疑，体现了客观全面的原则，这种辩证的观点是值得赞赏的。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对一个人，还是对一件事，都不能以偏概全，一叶障目，一概而论，都应该一分为二，实事求是，客观评价。



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

□ 何立波

“修昔底德陷阱”源自古希腊著名史学家修昔底德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对公元前5世纪雅典和斯巴达的冲突导致战争“不可避免”的结果的论述。那么，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是否“不可避免”，真的存在“修昔底德陷阱”吗？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卷第23章第6节中有一段关于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爆发战争的记载。因为英译本是面向普通读者的普及性读物，很多译文并不够严谨和确切。它的英文翻译成中文就是：“使得这场战争不可避免的是，雅典人势力的壮大以及斯巴达由此产生的恐惧。”如果从古希腊文来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话，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国内的中文译本中，唯一一本从古希腊文翻译过来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何元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页）写道：“我相信，战争的真正原因，尽管很少为人所知，是势力壮大的雅典人，引起了斯巴达人的恐惧，从而迫使他们开战。”

根据国际古典学界最新研究，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避免”的战争。这里有一个关键词“anankasai”，过去被译为“不可避免”，而实际上它在这里是“迫使”的意思。据美国古典学家利西和奥斯特瓦尔特的研究，这里“迫使”指的是发起者雅典人而非斯巴达人，因此是雅典人迫使斯巴达人开战，并非斯巴达人迫使雅典人开战。即便将“anankasai”译成“不可避免”之类，也不意味着这场战争的爆发具有客观必然性，更无法得出“势力壮大引发恐惧从而导致战争”这一“铁律”。

身为雅典将军的修昔底德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后世考察公元前5世纪中期希腊各城邦之间关系的主要史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叙述时间从公元前431年到前411年，反映了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



陶器上的古希腊时代战争图样，表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场景

战争，可以说是一部公元前5世纪晚期的希腊政治史。但是这部史书并非是对这场战争全面的真实的记录，而是作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带着某种寡头倾向，对历史事件有选择性地加以详略有别的记载，对伯罗奔尼撒战争进行了自己的建构。修昔底德的判断并未被学者们普遍接受，格罗特、迈耶、格兰迪、卡根和德圣克鲁瓦等希腊史专家，都对修昔底德的论断提出质疑。

修昔底德强调的“恐惧”，这是一种心理因素。就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来说，现实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恐怕要比心理因素更真实。希腊史学者康福德、贝洛赫、卡根、汉森、卡特利奇等利用考古发现、铭文材料、古典文献等材料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了不少新结论。康福德认为，是商业利益引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比雷埃夫斯港的商人迫使伯里克利发起战争。贝洛赫强调雅典与其他希腊城邦尤其是科林斯和麦加拉之间的商业竞争在战争爆发中的作用。卡根认为，雅典势力的增长和斯巴达随之而生的恐惧催生了战争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雅典的势力在公元前445到前435年并未有大的增长，其野心也并非是非无止境，而斯巴达

也未产生过分的恐惧感。斯巴达和雅典实际上都各自拥有三种选择，战争并非唯一选择。卡根得出结论：“没有人策划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也没有哪个城邦需要这样一场战争。”

在雅典和斯巴达的冲突中，斯巴达一直保持了克制的态度，并不存在深深的恐惧。公元前460年，雅典的手伸到了希腊大陆，不仅接纳斯巴达敌人美塞尼亚人流亡者，还让斯巴达盟邦麦加拉加入提洛同盟，攻击斯巴达盟邦埃吉那，与斯巴达主要盟邦林斯发生冲突并使后者遭受重创。而斯巴达一直保持宽容，直到公元前432年才在科林斯人的煽动下对雅典宣战。卡特利奇提出，即使最后真的是斯巴达率先开战，在公元前432年的公民大会上，斯巴达人也只不过是不过不想被人嘲笑怯懦才赞成向雅典宣战的，而且在开战前斯巴达人还继续与雅典进行外交斡旋，甚至在德尔斐神谕同意他们进行战争后也没有马上开战。如此性格的斯巴达人，不可能是战争的挑起者。从公元前5世纪中叶希腊城邦政治局势发展和古希腊城邦居民思想观念来看，战争的爆发并非不可避免。但国与国之间如果一再发生战略谈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